

暨南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熊增珑:

提升对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的认识 为“共建人文湾区”贡献力量

日前,暨南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熊增珑,向记者介绍了目前对大湾区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全面梳理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我们应充分认识大湾区文化遗产在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地位,切实研究、保护、利用好大湾区文化遗产,为‘共建人文湾区’贡献力量”。

1 中国之大湾区

收藏周刊:请您谈谈我们目前对大湾区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全面梳理的必要性。

熊增珑: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在2035年,大湾区要实现“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多元文化进一步交流融合”的宏伟目标。同时,要求坚定文化自信,共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发挥粤港澳地域相近、文脉相亲的优势,联合开展跨界重大文化遗产保护,合作举办各类文化遗产展览、展演活动,保护、宣传、利用好湾区内的文物古迹、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支持弘扬以粤剧、龙舟、武术、醒狮等为代表的岭南文化,彰显独特文化魅力。

为实现上述目标,在做好保护和利用工作的前提下,我们有必要对大湾区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全面梳理,正确认识其重要意义,要在更高、更广的范围内进行思考。

收藏周刊:大湾区文化的源头在哪里?大湾区文化与北方中原地区文化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的关系呈现在哪些方面?

熊增珑:粤港澳大湾区地处岭南,包括广东九个子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目前考古发现表明,从旧石器时代中期,该地区就有人类活动。新石器时代遗址多达千处,在华南地区占有重要位置。广州黄埔岗头岭遗址等的发掘证实大湾区也有自己风格的夏商周文化遗存,南越王宫、南越王墓遗址等表明大湾区在秦汉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了重大发展。

追溯大湾区文化的源头,在韶关市曲江马坝镇发现的人类化石,证明早在13万年前,在广东北部地区已有早期智人活动,其形态已显示出蒙古人种的特征,是直立人向智人过渡的重要代表。在距今30000—10000年间,青塘遗址的发掘发现了广东乃至岭南最早的古代墓葬,并从中发掘出保存较为完整的人体骨架,这是广东保存最完整的一万多年



■广州黄埔甘草岭遗址出土玉琮残件。
邓聪教授拍摄



■岩山寨遗址。刘锁强供图



■南海Ⅰ号沉船第四层堆积正射影图。肖达顺供图

以前的古人类化石,为广东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考古取得的重大突破。

在中国考古学百年华诞,岩山寨遗址入选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是广东境内目前唯一在石灰岩孤峰顶部、山体多个溶洞及外围台地皆发现丰富遗存的大型先秦聚落遗址,面积超过8万平方米。墓葬形制、丧葬礼俗及随葬器物组合都具有显著的石峡文化特征。岩山寨遗址是岭南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中心聚落遗址,其考古成果为深入研究岭南地区先秦聚落形态演变、早期社会文明化与中国化进程、环南岭地带及周边地区的早期人群互动与文化交流、稻作农业的早期传播等课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新材料。

商周时期,来自粤东的酱黑色釉原始瓷的制作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并传播至珠三角地区;礼器类的青铜鼎、钟也在横岭山先秦墓葬群众出现;种种迹象表明,大湾区文化与长江下游的越文化等保持密切往来。到了战国时期,“米”字纹陶范围不断扩大,大湾区整体文化面貌趋同现象明显。至秦汉时期,已纳入中原王朝统一管辖。

总之,大湾区的文化发展与北方中原地区及长江中下游的文化动态息息相关,不是传统上所认为的岭南独居一隅,应该纳入“中国化”的历史大进程中来看,是中国文化多元底盘上发生的一体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填补了大湾区文明起源、国家形成过程的阶段的空白,掀开了大湾区历史文化与社会研究的新篇章,进一步揭示了大湾区在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贡献。

2 亚洲之大湾区

收藏周刊:大湾区文化又是如何对东南亚地区带来影响的?它的载体有哪些形式?

熊增珑:就在大湾区先秦时期的先

民在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互动的同时,其文化不断影响东南亚等地区,扮演了不断把中国文化传播出去的前沿基地的角色,从而奠定了今天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关系,形成了有别于地中海文明的东亚国际秩序,在亚洲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

一是农业的传播。农业的发展与传播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变革之一,史前农业向中南半岛的扩散关系到现今南亚语族的形成,是农业传播领域的重要科学问题。农业的传播使世界其他非原产地成了早期全球化的受益者,域外人民从舌尖到口腹都得到了必要补充,传播的不仅有形的稻、粟等(包括耕作技术),还有无形的稻作、旱作精神文化。中国文化史,是谷物生产孕育出来的精神遗产。目前,中南半岛稻作和粟作农业的源头无疑在中国已是学术界的共识,在具体的传播路线和时间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发掘和保护好大湾区的农业遗存对于解决东南亚农业传播及文化交流至关重要。

二是玉器的传播。大湾区的玉文化受长江流域玉文化的影响,距今5000年形成了以珠江口为中心的玉文化圈,在珠海、香港、澳门等地发现了较多的制玉作坊,遗址、墓葬内出土了大量的玉器。此后经闽粤沿海登陆台湾,在台湾南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内发现了与珠江口地区内涵相似的玉器器型,并经台湾岛实现了对中南半岛直线传播,如红河流域的越南冯原遗址也出土了与香港大湾遗址类似的玉石器。玉文化的传播跨海到达吕宋岛、巴拉望岛至菲律宾群岛,以及更远的太平洋岛屿,形成了环南海玉文化圈。玉器的传播除了实物和技术外,其实还将精神层面的信仰等传至东南亚地区。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赞誉岭南地区是“真正的南方”,是探索中国古代与印度支那半岛甚至南太平洋地区的一把钥匙。大湾区又处于岭南的中心位置,其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3 世界之大湾区

收藏周刊:粤港澳大湾区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熊增珑:粤港澳大湾区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无疑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及兴盛。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链接东西方重要的海上通道,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对话之路,是东西方不同文明之间经济、文化、科技、宗教和思想相互传输的纽带。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由此实现了贸易交流,各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也沿着海陆不断传播开来。在历史上,广州是中国走向海洋的起点,由广州出发的南海航线,从先秦到明清,由近及远不断延伸,从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一直延伸到大西洋两岸,逐渐发展成为航线交错的全球性海外贸易网络。

至少在晚唐时期,由于“黑石号”沉船的发现,广东珠三角及东部、西部一些窑址生产的瓷器随“黑石号”走出了海外;“南海Ⅰ号”的发现更为重要。“南海Ⅰ号”是一艘木质古船,船体残长约22.1米,最大船宽约9.35米。船上除了外销瓷器以外,还有铁器、铜镜、金器、竹木漆器等,按照当时货币与当今货币比值计算,这艘沉船的器物总价值在2000多万元,可谓价值连城。尽管在海底沉睡了800年,但还是我们迄今发现的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宋代古代商贸沉船。通过对船上的货物与陆上的考古资料对比,推测此船应是从杭州装载铜镜和金器后始发,在宁波装载景德镇、龙泉以及越窑瓷器,并在泉州装载铁器和福建窑口的瓷器,最后从广州驶离。根据沉船的金器、砝码等推测,该船的目的地可能是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地区。

国外的考古发现也证实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在沙特阿拉伯塞林港,中沙考古队员在遗址中发现了包括铜砝码、青金石、玛瑙、象牙制品、钱币等,同时还发现了阿拉伯石器、波斯釉陶及来自中国的瓷器(包括宋元时期的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以及明清时期的青花瓷),生动展示了塞林港作为国际贸易海港的历史画卷,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考古实物资料。塞林港发现中国瓷器的情形,表明至迟到元明时期,中国瓷器已经行销于红海地区。考古实证表明,可能早在唐代,中国与包括红海在内的中东地区已经进入一个陶瓷贸易的高峰时期。沙特阿拉伯塞林港出土十三世纪砝码与“南海Ⅰ号”发现的砝码极为相似,说明在沙特用于奢侈品交易标准跟中国有一致性。

绵亘万里,延续前年的海上丝绸之路,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核心丝路精神,也为大湾区留下了大量的海上丝绸之路史迹,这是大湾区的历史财富,也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近年来,粤港澳三地联合就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东西汇流”“海上瓷路”“岭南印记”“三城记—明清时期的粤港澳大湾区与丝绸外销”等展览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保护是利用的前提,利用是发挥文化遗产价值的手段,但提升大湾区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认识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我们应充分认识大湾区文化遗产在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地位,切实研究、保护、利用好大湾区文化遗产,为“共建人文湾区”贡献力量。